

罗耀华* 贺黎

“V+向”结构的词汇化与介词并入

提要 本文着重分析了“V+向”类结构的词汇化，并从介词并入角度进行了跨语言的比较。“向”经历了由动转介的语法化过程，介词“向”萌芽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完成介词化，到唐五代时期，“向”的介词功能最终确定并且稳固下来，完成了向介词演变的漫长的语法化道路。通过介词并入，“V+向”结构也经历了词汇化过程，互信息值计算和语感调查的结果都表明“V+向”词汇化程度比较高，是典型的介词并入现象。“V+向”类结构融合度的高低，与三个因素有关，即“V”、“向”、“O”的类型及其互动有关，“V”对“向”、“O”具有选择性，“O”对“V”具有反作用。根据介词并入相关理论对其他语言的考察表明，介词并入在其他语言中也存在。汉语的“V+向”结构中的“向”通过介词并入，“向”并入动词，在原来的空位留下一个语迹。这是形式上的并入，也是句法-语义上的并入。介词“向”并入，是词汇化的手段之一，其前提是“向”的语法化的完成。

关键词 “V+向” 向 介词并入 语法化 词汇化

DOI 10.1515/caslar-2014-0014

1 引言

汉语学界对“动+介+宾”结构的研究成果颇多，但也一直聚讼纷纭，主要有：该结构中的介词是与动词先结合然后再与后面的宾语组成动宾结构，还是介词先和后面的宾语构成介词短语，再和前面的动词结合构成动补结构。冯胜利(2000: 150)从现代韵律学的角度上论证了汉语的[动+介+宾]结构够最好分析成[[动+介]+宾]。“动+介”是构成“动+介+宾”的基础，是指诸如“小猴子跳在马背上、来自北京”等结构，其中的介词主要有“于、自、到、至、向、往、在、给”等8个(邵敬敏、周娟 2008)，它们实际是动词和宾语语义关系的标记

***通讯作者：罗耀华：**男，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兴趣为现代汉语语法及词汇化、语法化，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现代汉语副词性非主谓句研究》和译著《词汇化与语言演变》。

电子邮件：yaohua@mail.ccnu.edu.cn

通讯地址：430079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52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贺黎：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研究生

电子邮件：gaoyiheli123@163.com

通讯地址：430079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52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陈昌来 2002) 和枢纽。“V+向+O”结构的研究成果, 不如动词加介词“到、自、在”等的多, 但存在的纷争也不少。首先, “V+向+O”结构中“向”的归属, 先后有动词说(孟建安 1999 认为是后附助动词), 介词说(马贝加 1999; 方绪军 2004; 王永娜 2011), 动介二元说(马梅玉 2013 认为是类词缀)等不同看法。其次, “V”和“向”二者的关系, 或认为两者各自独立, 相互之间没有依存关系, 可以表述为“V+向”(陈永生 1981; 朱德熙 1982); 或认为“V+向”为一个独立体, “向”没有独立性, 依附于“V”, 表示为“V向”(吕叔湘 1999; 马贝加 1999; 方绪军 2004; 蒋同林 1982; 马梅玉 2013; 孟建安 1999)。此外, 是从句式角度对“V+向”进行的研究, 不少学者已得出了一些新结论。纵观已有的研究, 多侧重形式, 很少涉及语义; 研究对象也存在不平衡性, “在、到、于”及其变体“de”研究较多, 其他介词研究较少; 句法-语义的互动对结构的影响研究也不多。因此本文拟对“V+向”结构进行再思考, 并主要从“向”的“介词并入”上考察这一结构, 以期从语法化和词汇化的角度深化对这一结构的认识。

2 “向”的语法化

作为讨论“V向”词汇化的基础, 我们先讨论“向”的语法化。

朱新军(2008)指出: 语法化进行的重新分析不是仅仅一次, 而是有着多次的重新分析。这种多重分析的存在, 导致了语法化的过程是渐进的。同样地, 经过长时间的语法化, 目前的“向”字已经有了很多的语义项。《现代汉语词典》中“向”的义项为: (一) 方向: 志~ | 风~。(二) 动词。对着。特指脸或正面对着(跟“背”相对): ~阳 | 面~讲台 | 两人相~而行。(三) 将近; 接近: ~晓 | ~晚。(四) 动词, 偏袒: 老乡~老乡。(五) 介词表示动作的方向: ~东走 | ~先进工作者学习 | 从胜利走~胜利。

研究表明, “向”的最初语义是窗户(依《说文解字》), 例如:

(1) 穹室熏鼠, 塞向瑾户。(《诗经》)

这是其最原始的意义。发展到今天, 经过多次的重新分析, “向”已经有了很多的义项。为了大致了解这些义项的使用情况, 我们通过国家语委语料库^①字词查询得出如表(一):

① <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

表（一）“向”的使用情况

出现次数	词语串
11351	向/p 介词
146	向/n 名词
124	向/v 动词
9	向/d 副词
2	向/q 量词
1	向/o 拟声词
1	向/vd 趋向动词

表中可见名词性的“向”有146次，介词“向”使用频率高达11351次，动词用法的“向”的使用频率124次。“向”由最初的名词用法演变为不同词性的用法，语法化作用极大的改变了“向”的性质和功能。马贝加（1999；2002）、刘祥友（2007）、史冬青（2008）、李彦强（2010）等均考察过“向”的虚化过程，在前贤时哲的研究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对“向”字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梳理。

2.1 名词“向₁”

“向”最早的用法是名词，意为“窗户”。

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向”的解释为：北出牖也。从宀从口。《诗》曰：“塞向瑾户。”“向”最原始的意义是“窗户”。

“向”作为名词，在词义上后来有新的发展。诸子散文中，“向”作为名词更多的解释是“以前”。《庄子》中有：

- (2)（子贡）其弟子曰：“向之人何为者邪？夫子何故见之变容失色，终日不自反邪？”（《庄子》）
- (3) 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庄子》）
- (4) 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虚而今也实。（《庄子》）

此三例均解释为“以前”，且该意义在语义滞留作用下，一直保留在现代汉语的“向来、一向”等词语中。

2.2 动词“向₂”

动词“向”在先秦两汉时期大量出现，该时期“向”的动词义项占主导，主要有：（一）面对，朝着；（二）向……前进，进军；（三）仰慕，迎合。第一个义项“面对，朝着”是由本义“窗户”引申而来。马贝加（2002）认为先秦时期动词用法的“向”已经产生，并且有“向₁”和“向₂”两个义项，这两个义项在先秦时期使用频率很高。例如：

(5) 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国语》）

(6) 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李斯《谏逐客书》）

(7) 秦、韩并兵南向。（《战国策》）

可以看出，“向₂”是“向₁”（即名词的“向”）的主观抽象后的结果，由单纯的“面对，朝着”义抽象成“向……前进，进军”义，也可以理解成“接近，前往”义。抽象的过程进一步加深，至汉朝末期，“向”引申出更为抽象的义项“仰慕，迎合”。例如：

(8) 今西伯昌，人臣也，修义而人向之。（《韩非子》）

(9) 吴王曰：鼂止，子无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越绝书全释》）

先秦两汉时期，“向”作实义动词占主导地位时，其主语多为表人的名词，少有例外。从实到虚，由具体向抽象，是语法化的一般规律，也是词义虚化的结果。词义的虚化往往是在引申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化、主观化，因此虚化可以视为词义引申的延续或继续。由名词“窗户”引申产生的“向”的三大动词义项：“面向”、“朝着”，“前往”、“接近”与“迎合”、“仰慕”，如例(9)根据俞纪东的译注^②，意思为“太宰鼂不要多说了，你恐怕是在迎合我的心意吗？这不是忠臣的作为”。“向”的动词义在先秦两汉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向”语义的转变，义项的增加，为“向”的进一步虚化，即由动向介的转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2.3 介词“向₃”

介词“向₃”由动词“向₂”发展演变而来。

^②（东汉）袁康、吴平辑录；俞纪东译注1996，《越绝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第114页。

刘祥友 (2007) 指出,“向”的虚化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意义是其介化条件,句法地位是其介化途径;介化条件、介化途径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向”由动词向介词转变的介化条件已经形成,动词义项的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个过程的持续势必导致“向”最终实现真正介化,下面就从句法角度分析其介化途径。

史冬青 (2008) 指出两汉、魏晋时期出现了“向+N+V”格式,而且这种格式相对先秦时期的“向+N+而+V”而言,在使用频率上“向+N+V”格式呈急剧上升的趋势。例如:

- (10) 向水火而泣,能涌水灭火乎? (《论衡》)
- (11) 翁叔从上上甘泉,拜谒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论衡》)
- (12) 三将至,缪公素服郊次,向三将哭曰…… (《史记》)
- (13) 今秦欲攻梁、安邑,秦得梁、安邑,以东下河,必表里河,而东攻齐,举齐属之海。南面而孤楚、韩、梁,北向而孤燕、赵,齐无所出其计矣。(《战国策》)
- (14) 秦并赵,北向迎燕。燕王闻之,使人贺秦王。(《战国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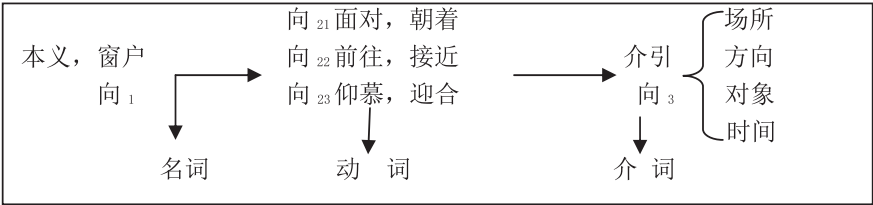
例(10)中的“向水火而泣”与例(11)、(12)中的“向之泣涕沾襟”、“向三将哭”相比,连词“而”的缺席并没有使句子的意义发生变化。同样,例(13)中的“北向而孤燕、赵”与例(14)中的“北向迎燕”相比,“而”并没有改变句义。“向+N+V”格式与“向+N+而+V”在历时发展上具有连贯性,根据语言经济性原则,“向+N+V”可能是由“向+N+而+V”发展而来。此时的“向+N”为后一动词的修饰语,可以分析为动宾结构,也可以分析为介宾结构,此时的“向”处于动介转化的过程当中。再如:

- (15) 世尊遂向民灵山遥望火坑,以手指其一指,火坑变作清凉池。(《敦煌变文集·悉达太子修道因缘》)
- (16) 拂衣向西来,其道直如弦。(唐·白居易《孔戡》)
- (17) 人随川上逝,书向壁中留。(唐·崔曙《登水门楼见亡友题黄河诗因以感兴》)
- (18) 填填满心气,不得说向人。(唐·元稹《感梦》)
- (19) 向今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胡颜独存也?(唐·陈玄佑《离魂记》)

例(15)、(16)中“向”引介动作的方向,例(17)中“向”引介动作的地点,例(18)中“向”引介动作的对象,例(19)中“向”引介动作的时间。刘祥友 (2007) 认为,这时的“向”已经虚化为介引场所类、方向类、对象类、时间类论元的介词。因此,

“向”义增加，词义变化为“向”的介化提供必要条件，它的句法地位至此已基本确定，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进一步抽象化、主观化，“向”已虚化为介词。

由此可见，“向”的介词化过程实际上与“向”的语义虚化过程是分不开的，“向”经过动词主导阶段的本义引申，进而因语义泛化而导致义位增加，为“向”的句法地位的确立奠定基础；再经过“向”第二阶段的语义演变，是动词主导阶段的进一步抽象和主观化，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向”表示介引场所类、方向类、对象类、时间类论元的介词的地位已确立，至唐、五代，其介词化过程已基本完成。“向”的虚化轨迹为图（一）：



图（一）“向”的语义演变图

归纳起来，介词“向”萌芽于两汉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介化，在用法上呈多样化趋势。至唐五代时期，“向”的介词功能最终确定并且稳固下来，完成了其向介词演变的漫长的语法化道路。

3 “V+向”结构的词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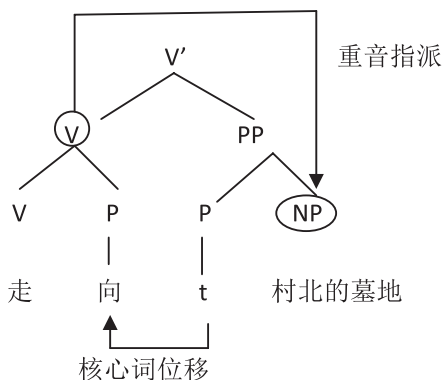
伴随“向”语法化进程的是“V+向”结构的的词汇化，即“V•向”的凝固化，这可以从“V+向”结构的凝固化、“V+向”的MI值计算与语感调查等角度来讨论。

3.1 “V+向”结构的凝固化

“向”实现语法化后，其虚化进程并没有因为语法化为介词之后而停止，而是继续进一步的虚化，依附于V，出现介词并入，即“向”通过重新分析而加接到动词上，与后者并入，成为后者的构成成分，实现固化。理由有：

第一，韵律上，“V+向”可以构成韵律词。冯胜利（2000）从韵律学的角度上论证了汉语的[动+介+宾]结构够分析成[[动+介]+宾]，他指出“汉语句子的基本成分必须严格遵守普通重音‘右重’的要求”，而“汉语的普通重音是以最后一个动词的为中心来构造句尾重音的韵律单位的”，故“宾语的重音要由动词，而不是介

词来指派”，是以“[动+介]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语法成分，属动词范畴（复合动词）”，而宾语应是“这个新的复合动词的宾语”。他解释为：这里动词跟介词的重新分析之所以一定要发生是汉语特的殊韵律结构的要求，是由重音的指派造成的。因为汉语的普通重音是以最后一个动词为中心来构建句尾重音的韵律单位。“走向村北的墓地”重音指派树形图，如下：



（注：此图依据冯胜利（2000：154）图表改编，原图用例为“放在桌子上”。）

“向”并入动词“走”，原来的P留下一个空位，不再阻挡V对NP的管辖；且P并入之后，[V-P]组成一个独立的语法成分，因而NP很容易通过这个复合（复杂）动词得到它应该得到的重音。这也充分证明了在韵律上[V-P]自成韵律单位，且“语音停顿应在V+向”之后。例如：

- (20) 毛主席……是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伟大舵手！（宝日勒岱《把千里草原建设成祖国的钢铁长城》）
- (21) 萨利亚与林顿相视而笑，一股暖流流向她的全身。（黄俊明《红十字计划》）
- (22) 临我回来，十点刚过，正见人山人海，奔向空场和海滨。（李健吾《威尼斯札》）

例(20)–(22)中的“走向、流向、奔向”是一个韵律单位，为句中谓语，支配后面的宾语“更大胜利的伟大舵手、她的全身、空场和海滨”。从结构上看，应当分析为[流向[她的全身]]，而不是[流[向她的全身]]。

第二，表完成貌的动态助词“了”加在“V+向”之后。例如：

- (23) 这样，亚里士多德又最终走向了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荣开明 赖传祥《论矛盾转化》）

- (24) 因为她自己的思想也已张开了翅膀，飞向了远方……肖云星《天幕下的恋情》)
- (25) 于是打击的箭头，指向了战线的东部，大军云集在照阳江北岸。(骆基《怒涛》)

“了”作为时体标记，加接在动词后面表示动作的完成。例 (23)–(25) 中的“了”分别加在“走向”、“飞向”、“指向”后面，而不是直接放在“走”“飞”“指”后面，这也证实“V+向”是一个由[动+介]构成的独立体。

第三，部分“V+向”可以单说，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

有些“V+向”结构凝固性程度较高，中间不能插入“得、不、着、过”等成分，这种结构凝固性是指词不易添加别的词语、不具有扩展性来讲的。它是语言学界公认的最重要的区分词和短语的方法(崔应贤 2004: 81)。例如：

- (26) 重力仪的本事不小，要是地下有比较重的矿，悬锤就偏向它。(郭以实《金娃娃》)
- (27) 照近来美国政府的措施来看，罗斯福对于华伦教授等人的主张，似乎发生了失望和厌倦，颇有心回意转，倾向正统的货币观念的趋势。(张兹《最近美国货币政策之趋势》)

(26)的“偏向”和(27)的“倾向”等少数“V+向”类结构已经收录入《现代汉语词典》，这类词语的存在也证明了“V+向”类结构的凝固性已经很强，甚至有的已经为词典收录，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

第四，“V+向”具有语义上的整体性。

“V+向”实现词汇化后，原来专属“向”的指向性便成为整个“V+向”的属性了。单独的动词如“走、奔、冲、飞、流、飘、滚、转”等很难表达出[+方向]特征，只有和“向”字组合后，其[+方向]特征才得以显现。《现代汉语词典》中“向”字的介词义项解释是“表示动作的方向”，“V+向”类结构的[+方向]由介词“向”实现，例如：

- (28) 他又会把脸转向众人，接着说：“我屋里的米豆腐啊，挂了牌的。”(肖建国《米豆腐》)
- (29) 悠扬的《采茶新歌》，随着和煦的东南风，飘向远方……(熊炜《漫话庐山云雾茶》)

光是“转”、“飘”表达不出方向性，单独的介词“向”又没有动作的主导，只有动作和方向的结合即“V+向”才可以表达“动作和方向”这一意义。因此，“V+向”在语义上是具有很强的整体性的。吴为善(2011: 356)指出：介词短“一旦移到VP之后，动词与介词就结合极紧，语法学界把它们看作是‘动介式’句法词。”这种

“动介式”句法词由介词语法化之后通过介词并入依附于前面的“V”，即“向”通过重新分析而加接到动词上，与后者并入，成为后者的构成成分，实现词汇化。

3.2 “V+向”的MI值计算与语感调查

我们可以假定，若某一个词语串的共现频度越高，则词语串的结合紧密度越强。高频的词语串可能是一个完整的语块。通过互信息值的计算可以反映“V+向”这类词语串的紧密度，并作为“V+向”词汇化程度的一个参考要素。另外，对“V+向”在语流中的语感判断反映出人们在使用该类词语串时的直观感觉，也可以作为判定“V+向”类结构的词汇化程度的依据。

3.2.1 “V+向”互信息值

如前所述，采取计算互信息值 (MI) 是衡量“V+向”结合紧密度的方法之一，我们对《人民日报》（2003–2006年）四年语料进行统计，得到部分“V+向”的互信息值，表示为表（二）：

表（二）“V向”的互信息值

V向	V频次	向频次	V向频次	互信息值
走向	72723	154316	7216	6.16
迈向	8957	154316	719	5.86
奔向	7583	154316	334	4.99
伸向	5800	154316	234	4.86
砸向	1048	154316	38	4.71
涌向	6496	154316	228	4.66
洒向	2228	154316	77	4.64
驶向	7558	154316	212	4.34
扑向	4800	154316	109	4.03

我们运用CiCi软件^③进行统计，得到上表中的统计数据，其中“V+向”类结构的互信息值 ≥ 4的有：走向、迈向、奔向、伸向、砸向、涌向、洒向、驶

③ CiCi软件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余一骄老师研制并申请专利，用以统计字符串中二字符的字频，在此表示感谢。

向、扑向等共8个。互信息值 < 0 的有：折向 (-0.11) 、刺向 (-0.18) 、游向 (-0.97) 、追向 (-2.63) 、探向 (-3.34) 等21个。根据统计，可以讲“V+向”结构分为三种类型：高融合度（互信息值 ≥ 4 ）8个、中融合度（ $0 \leq$ 互信息值 < 4 ）35个和低融合度（互信息值 < 0 ）21个。这表明，“V+向”类结构的高融合度词语还不多，中融合度、低融合度则占绝对优势。我们认为，融合度高低的差异与“V”的类型以及“向”后面的“O”的类型有关，相关内容将在后文详述。

3.2.2 “V+向”语感调查

判断词汇化程度高低的另一个方法是进行语感调查，我们通过对普通语言使用者进行问卷调查，试图了解正常语感条件下，人们对目标结构的词汇化认可度。进行语感调查，首先要设计高质量的调查问卷，通过国家语委语料库，我们对“V+向”的语句进行了筛选，囊括使用频率较高的“V”，并且数量适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30个句子，其中互信息值在4以上的10个，0到4之间的10个，0以下的10个。本调查选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语言专业的2012级研究生、本科生各25人，共计50人为调查对象（其中男生15人，女生35人），在隐藏调查目的的基础上，让调查对象对遴选出的30个含“V+向”的句子进行词汇判断作业，要求依据语感，对30个句子进行词语切分作业，要求切分到词为止。回收有效问卷50份，结果统计如表（三）：

表（三）“V向”词汇语感调查统计表

V向	词汇认可率（%）	V向	词汇认可率（%）	V向	词汇认可率（%）
走向	86	流向	82	拖向	74
奔向	86	抛向	82	游向	84
伸向	56	推向	70	刺向	52
砸向	54	投向	82	杀向	74
涌向	80	冲向	90	压向	82
扑向	78	扫向	80	拉向	74
迈向	96	飘向	92	升向	74
洒向	70	通向	62	举向	82
转向	80	插向	82	探向	86
驶向	96	吹向	82	弹向	88

从表（三）可见，语感调查选取的这30个不同互信息值阶段的具有代表性的动词与“向”的组合，在普通语言使用者的语感知中是作为词出现的。这

里，所有“V向”的词汇认可度均超过50%，最低的是“刺向”52%、“砸向”54%和“伸向”56%，绝大部分的“V向”词汇认可度超过80%，这表明调查对象将“V向”视为一个词。从互信息值和语感调查可见，共现频率是影响“V+向”词汇化的因素之一。“V+向”共现频率越高，成词的可能性也越高，这可以从互信息值上进行观察，凡互信息值高的，“V+向”成词的几率就高，当然，这只是一个衡量的标准，有时即便互信息值很高，“V+向”之间短语特征仍很明显。语感调查支持上述观点。

4 “V”和“O”的类型对“V·向”词汇化的影响

“V+向”类结构融合度的高低，与三个因素有关，即“V”、“向”、“O”的类型及其互动有关，“V”对“向”、“O”具有选择性，“O”对“V”具有反作用。“向”作介词用时跟在动词后面表示这个动作的方向，也就是说单纯的动词只有和介词“向”组合后才能准确表述动作的方向性。因此，什么样的“V”可以进入结构，此结构后面的宾语“O”又有什么特点，“V+向”与“O”又存在什么样的语义关系呢？本节对此进行讨论。

4.1 进入“V+向+O”结构的“V”

4.1.1 “V”为主体位移的动词

当“V”为主体位移的动词，此时的“V+向”具有[+方向]、[+主体位移]两个语义特征。这类动词有“走、跑、奔、逃、迈、赶、折、撤、退、飞、驶、驰、转、移”等，例如：

- (30) 大量珍邮几经易主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给国内集邮者带来的是……（中国青年报社，1991年6月4日）
- (31) 刘猛背起枪，他俩就跑向小成隐蔽的芦苇里。（刘山朵《茁壮成长》）
- (32) 小河掠过柞树、槐树、柳树、楸树、杨树迷离交织着的摇曳碎影，急火火钻过青花石桥洞之后，绕来拐去，再奔向哪里，在我童稚的心里，就是一个难解的谜了。（孙震《海鸥》）

刘月华（1998：69）曾指出“走、跑、奔、流、爬、赶、追”等表示位移体自身的运动的动词和“去”结合时“多见于文学作品，用于叙述句”，该说在语料库中得到验证。储泽祥（2005：62–69）对“V往+O”的语义约束进行过讨论，认为位移的方向（外向 > 泛向 > 内向）、位移的速度（快 > 慢）、位移的距离（远 > 近）、目的地的空间范域（大 > 小）、位移的工具（有 > 无）、V的赋

元能力（必须介引 > 不必介引 > 不能介引）等V与O的语义特征，都会对“V往+O”格式的构成产生影响。就位移方向而言，存在如下的区别：

外向位移	>	泛向位移	>	内向位移
走向世界		通向四川		*买向老家
跑向编辑部		赶向出事地点		*取向福建
奔向深山老林		游向湖心		*抢向小明家
?扔向海边		*捉向监狱		*抬向仓库
*上向泰山		*查向宿舍		*来向北京

上述序列中，越往右，越难以构成“V+向+O”格式，因为它们与“向+O”的方向正好相反，语义上有矛盾，不能组配在一起。

再看位移的速度。《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走”的解释为“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跑”的解释为“两只脚或四条腿迅速前进（脚步可以同时腾空）”；“奔”的解释“直向目的地走去”。“走、跑、奔”均能跟“向”组配，从位移速度上来看表现为：走 > 奔 > 跑。使用频率上（依据CCL语料库）：走向（用例18887）> 奔向（用例1445）> 跑向（用例425）。这说明，位移速度越慢，使用频率越高，进入结构越容易。

再看位移的目标，即“走向、奔向、跑向”的宾语：“走向”的宾语为“反动的事实、世界、我的小屋、卧室、成功的道路、顺利的时候、社会主义、垃圾桶、死亡、毁灭、鼎盛、繁荣、崩溃、街头”等；“奔向”的宾语为“太阳系空间、大海、宇宙、天堂、终点、远方、未来、大海、车站”等；“跑向”的宾语为“那个目标、另一个方向、世界、车厢、手术室、客厅、出事地点、树林、终点、河岸、另一条大河、沙滩”等。从位移的目标来看，“走向”的终点，可以是实体性的处所（如“卧室、垃圾桶、车站”等），也可以是虚拟的处所（如“成功的道路、社会主义、死亡”）；“奔向”的终点，多为实体性处所，虚拟的处所较少；“跑向”的终点，倾向于实体性处所。

4.1.2 “V”为主体非位移的动词

当“V”不表示主体位移时，“V”具有[+方向]、[-主体位移]等语义特征。这类动词有“伸、踢、指、吹、探、扑、洒、抽、刺、射、投、扔、推”等。例如：

- (33) 第一次见面时，她把手懒洋洋地半垂着伸向我……（苏叔阳《安娜小姐和杨同志》）
- (34) 因此，费尔巴哈幸福观的锋芒便指向了禁欲主义和抽象道德哲学。（葛树先《费尔巴哈幸福观批判》）
- (35) 当梁校长宣读这个名字时，正在交换着意见的教师们眼光都投向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章以武《长生水》）

例中“伸向、投向、指向”，主体并未发生位移，如(33)中，位移的只是主体所属的肢体的一部分；例(34)主体为“锋芒”，同样未发生位移；例(35)中主体“教师们”也并未位移。

这说明，“V”的类型不同，对“V”的主体、位移及位移的方向都会产生影响。作为一个位移事件，至少具备三个要素：物体、运动方向、力的大小。同一个介词可以标引不同的语义角色，如“向”可以标引方向、对象、目标和终点。根据崔希亮 (2006: 38–39) “向”和“往”都能标引位移趋近的目标，但是它们在所标引的目标小类上是不同的。如：

处所性目标	跑向礼堂	跑往礼堂
	向礼堂跑去	往礼堂跑去
方位性目标	向桌子上扔	往桌子上扔
	向墙上抹	往墙上抹
指示性目标	向这里跑	往这里跑
	通向那里	通往那里
靶子目标	向敌人砍去	*往敌人砍去
	砸向汽车	*砸往汽车
	足球飞向裁判	*足球飞往裁判
归宿性目标	走向命运	*走往命运
	奔向理想	*奔往理想
终点性目标	撞向地球	*撞往地球
	抛向大海	*抛往大海

“V向”和“V往”在“处所性目标、方位性目标、指示性目标”三个方面是共通的；而在“靶子目标、归宿性目标、终点性目标”上存在差异，因此后者一般难以成立。这也证明，“O”的类型不同，对“V向”、“V往”结构的成立具有制约作用。

4.1.3 “V”表示物的运动状态

还有一类“V”不是表达主体的位移/不位移，而是表示物的运动状态。此时的“V+向”具有[+方向]的语义特征，但[+位移]义基本不显著或者说特别抽象。此类动词比较少，主要有“斜、偏、倒、倾、趋”等。例如：

- (36) 当倒向右边时，重心和重力作用线又跑到接触点左边，不倒翁又向左倒。
(《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 (37) 第二种类型是妇女上穿青色紧身斜襟短衫，其衫腰窄摆宽，前襟从中缝顶直斜向右腋，形成一条别致的领排…… (汛河 《布依族风俗志》)

- (38) 重力仪的本事不小，要是地下有比较重的矿，悬锤就偏向它。郭以实《金娃娃》)

几例中主体为“不倒翁、前襟、悬锤”，具有[-有生命]的特点，“V向”呈现出的是物运动后的状态。

归纳起来，“V”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主体位移动词，主体非位移动词和物的运动状态动词。三类动词，与“向”进行组配，但可以组配的动词是有限的，很多动词不能同“向”组配，如“安、思、安插、安排、安置、熬、拔、掰、清理、准备、组织、注意、嘱咐、指挥、争吵、笑、思考、疼、死、”等，换言之，“向”对“V”具有选择性。

4.2 “V+向+O”结构中“O”

“V+向+O”结构中，“O”有不同的类型，有的表处所，有的表方位，有的表指示，有的表靶子，有点表目标，有的表归宿，有的表中间。

4.2.1 “O”为处所性宾语

处所名词分为一般处所名词（本身就表示处所）、兼做表地名、机构的专有名词或可以当作地方来看待的普通名词。例如：

- (39) 挂着各地牌照的50多辆大型卡车满载救援物资浩浩荡荡地驶向机场。
(新华社2004年新闻稿)
- (40) 英国科学家已设计了一艘恒星际核动力飞船，准备飞向南门二。(《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 (41) 南斯拉夫的边防军经过短时间的交战后，很快被迫撤向萨格勒布。
(《读书》)

例(39)–(41)中“驶向”、“飞向”、“撤向”的宾语“机场”、“南门二”、“萨格勒布”都是表示处所性宾语。

4.2.2 “O”为指示性宾语

表示指向性目标的宾语，一般含有指示代词“这、那”，构成的表处所的结构包括“这儿、哪儿、这里、哪里”等。例如：

- (42) 今天正逢集日，成千上万的各族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参加商品交易。（1995年10月《人民日报》）
- (43) 一条鹅卵石筑成的马道，从大门口由高而低通向那里……（《简·爱》）
- (44) 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1995年《人民日报》）

例(42)中“涌向”的宾语“这里”；例(43)中“通向”的宾语“那里”，均为指示性宾语；例(44)“奔向”带宾语“哪里”，同样如此。

4.2.3 “O”为靶子宾语

所谓的靶子宾语，指的是“V”动作直接施加于“O”事物，以其为靶子，例如：

- (45) 一位男患者持刀砍向正在看病的医生，一旁的陈护士上前阻止。（2004年新华社新闻稿）
- (46) 二十多米高的巨浪横空出世，恶狠狠砸向渔船。（1994年《报刊精选》）

例(45)–(46)中动词“砍向”、“砸向”的宾语分别是“正在看病的医生”、“渔船”，这些宾语都是动词“砍向”、“砸向”的命中目标，称为靶子宾语。

4.2.4 “O”归宿性宾语

“V+向”的宾语，为动作的归宿。例如：

- (47) 我毕竟是一个人，我是没有能力控制自己而终于一步一步走向命运所指引我走的道路上去。（西西《象我这样的女子》）
- (48) 事实上，成年人自我教育的过程就是他走向理想、完善人格的过程。（1994年《人民日报》）

例(47)和(48)中“走向”的宾语分别是“命运、理想”，它们归宿性宾语，为抽象名词，是动作行为的归宿。

4.2.5 “O”终点性宾语

终点性宾语指的是“O”是动作“V”所到达的终点，主体伴随动作一起，到达“O”处所，例如：

(49) 歹徒的一个同伙乘混乱之机，突然用头撞向王录江的下颚。(1994年《人民日报》)

(50) 他没有留下墓碑，角膜捐给需要光明的病人，骨灰也随花瓣洒向大海。(2004年新华社新闻稿)

例(49)中“撞向”宾语是“王录江的下颚”，歹徒用头撞，撞的结果是头到达“O”处；同样，例(50)中动词“洒向”宾语是“大海”，动作完成，主体“骨灰”也到达终点“大海”。

4.2.6 “O”是方位性宾语

现代汉语空间区域范畴有两类，一类是地点域，一类是方位域。地点域和方位域都可以作为地标成为参照的空间背景或位移参照的位移轨迹背景。例如：

(51) 辛德拉士兵狼狈不堪，匍匐在地，死命地跑向逃兵阵里。(《亚尔斯兰战记》)

(52) 经过老周事先的动员，老百姓都把粮食、衣物藏了，鬼子一来，都跑向山里。(知侠 铁道游击队)

例(51)中的“逃兵阵里”、例(52)中的“山里”均为方位性的宾语，处所词常常带“上、下、前、后、里、外、内、中”这类字，时间词也常常带“前、后、里、外、内、中”这类字。这类字表示方向和位置，叫做“方位词”。

归纳起来，“V+向+O”结构中，“V”有三种类型，“O”有六种类型，“向”会选择不同的“V”组合成“V•向”结构，该结构然后会选择不同的宾语“O”，三者之间，处于一个连动机制之中，能够进入结构的“V”依据CCL语料库，有56个，它们能与“向”组配成“V+向”结构，在不同的宾语类型中，只有“处所性宾语、指示性宾语、靶子宾语、归宿性宾语、终点性宾语”能够进入结构。

4.3 “V+向”与“O”的语义制约

如前所论，“V+向”的组配，有56个，而该组配对宾语“O”的选择，也可以分成五种类型，其中方所性宾语，不能进入结构。本节讨论“V+向”与“O”的语义制约关系，意在证明作为一个构式，结构的各个组成成分，都是组织的一部分，彼此之间具有相互制约的关系。“V+向+O”结构中由于对“V”的不同选择会导致“V+向”与“O”之间存在不同的语义关系，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当“V”表示人或物的移动时，宾语“O”就表示动作的移动方向。

(53) 人有一个目标，就会尽全力跑向那个目标。（姚明《我的世界我的梦》）

(54) 没有人帮她判断，她却必须跑向这个男人。（铁凝《大浴女》）

(55) 四哥往年的这时候总是频频跑向海边拉鱼人那里。（张炜《柏慧》）

例(53)–(55)的“跑向”的宾语分别为“那个目标、这个男人、海边拉鱼人那里”，这又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宾语：归宿性宾语、靶子宾语和指示性宾语。“V+向+O”的格式里，V所表示的移动并不一定要到达宾语表示的处所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即存在主体位移、主体非位移），宾语表示的处所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只是V的移动方向的标志。动词同样为“跑向”，但宾语可以是表示处所、也可以表示方位、表示靶子，甚至是时间（如“跑向二十一世纪”）。

当“V”表示行为动作但不表示位置移动时，宾语“O”就仅表示“V”的动作方向。这种格式里的“V+向+O”中的“V”多是表示人或物所发出的具有一定的方向性的动作的，但身体并不一定移动。此时的宾语可以是表示人或事物的。

第二，当“V”表示事物的位移后的状态时，宾语“O”就表示“V”的倾向。

(56) 四川的军阀已经纷纷易帜，倒向了北伐军。（吴福辉《沙汀传》）

例句中的“北伐军”表示“倒”的倾向。

第三，在“V+向+O”格式里，宾语无论是表示“V”的移动方向，或“V”的动作方向，还是“V”的状态倾向，都可以概括为“表示V的方向”。以上就是“V+向”和宾语“O”的三种语义关系。

至此，我们讨论了“V+向+O”结构中，“V”的三种类型，“O”的六种类型，以及“V+向”与“O”之间的语义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制约“V+向”词汇化的因素很多，大致说来，有语义相关性、双音化、句法环境等。首先，从韵律角度来说，受到重音指派规则驱使，“V+向”成为一个韵律单位，尤其是当“V”为单音节动词时，“V+向”受到双音化制约，有的成词，或成词倾向；其次，是语义上的相关性。“V+向”凝固成一个单位后，对其后的宾语“O”具有很强的选择性，而“O”反过来也会制约“V+向”，如“跑向”，宾语可以是处所性、方所性、归宿性、靶子性、指示性、终点性宾语，这跟“V”和“向”的特征有关：“向”类结构表示具有方位/对象/处所/时间方向事件，动词有“走、跑、逃、飞、迁”等，语义上具有[+方向]、[±位移]、[-终点]等特点，而“向”在结构中，有时可以指示运动的方向，它们在语义上具有相关性。最后，是句法环境。“V+向”后面出现表处所、表方位、表时间的成分时，“向”的介词性语义特征明显，但当宾语为“靶子性宾语、终点性宾语、归宿性宾语”等时，“向”的介词性语义特征则不明显。“V+向”的词汇化，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但当“向”句法上并入动词时，这种词汇化的趋势变得势不可挡。

5 介词并入及其跨语言比较

为了寻求理论上的解释,以及“V+向”结构词汇化的动因和机制,我们考察了古英语、荷兰语、Chichewa语等语言,发现在“动+介”组配中,介词并入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为“V+向”的词汇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事实证明。

Baker (1988) 指出,并入 (incorporation) 是一个词类成分进入另一个词的过程,即句法上词的融合。最早研究汉语并入现象的是汤廷池 (1997)。他认为,所谓的并入,是指“词语或词组借重新分析而加接到另一个语素、语词或词组,因而与后者合并或并入后者,成为后者成分的现象。汉语语法的并入现象,有发生于复合词内部的词法上的并入,也有发生于语词与语组间的句法上的并入;有以动词为主要语的并入,也有以名词为主要语的并入;被并入的语法范畴则包括名词、名词组、介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本节主要探讨介词并入的有关问题,先简单介绍现代汉语动介宾结构中的介词并入现象,再介绍介词并入现象在其他语言中的情况。

5.1 动介宾结构中介词并入的趋势

现代汉语中,介词的语序基本上是前置于谓语动词的,这是汉语介词的重要的语序特点。据孙朝奋 (1994),汉语两千年来语序稳定的唯一重要例外就是前置词短语由动词后向动词前的发展,因此难免还保留着部分介词后置的用法,这些介词很少,主要有“于、以、自、在、向、到、给、往”。这些介词的语序大部分已发展成前置于谓语动词,但仍保留着后置的用法,只不过随着语言的发展演变,它们的后置用法也在慢慢发展变化,它们慢慢的开始并入到其前的谓语动词里面,与谓语动词合并成一个整体。

现代汉语中的介词“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入到了其前的谓语中。潘望 (2009) 硕士论文中讨论了“向”的词化问题,他指出“V+向”组合如“偏向、趋向、走向、朝向”等已经完全融合为一个词,因此他认为“V向”中的“向”已经初步具有了典型构词词缀的特征,“向”具有并入到其前谓词的趋势。

5.2 介词并入的普遍性

介词并入是语言中存在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除汉语外,其他语言中也存在这种现象,英语 (包括古英语 (Goh 2001))、西班牙语、法语、埃及科普特语、Kinyarwanda语、Chichewa语、荷兰语等均存在介词并入现象。根据Goh (2001),英语中的介词并入很早就开始了。古英语 (Old English) 中,就有介词并入现象,主要是形态的合并。例如:

- (57) *And þe comaundment ys brokun, | and þe halyday,*
 And the commandment is broken, and the holy day
 byfore of spokun.
 previously of spoken
 ‘And the commandment is broken, and the holy day previously spoken of’
 (Denison 1993: 126)
 (戒律被打破，先前提及的圣日也一样。)

古英语中，一般出现的语序是P-V，而不是V-P，如例(57)；而且，在早期的例子中，V和P之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一些“V+P”组配的词汇化也许有助于中古英语出现V和P的重新分析。古英语中，已经有“V+P”组配，其介词宾语与动词的直接宾语在语义功能上平行。现代英语中，介词并入现象更加明显，具体表现在V后的介词慢慢跟V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固定搭配，其意义完全相互融合。如“*see through, come in, come across*”等，其中的介词“*through, in, across*”并入到其前面的动词时，相互融合为了一个整体，分别表示“看穿、进来、偶然遇见”，后面再带宾语。类似情况还有“*stumble across, take after, stand by, make for, grow on, come by, let into, show around*”等，在这些组合中，“动+介”在语义上已合并为一个整体了，它们共同充当谓语，支配后面的宾语。

根据Koopman (2000)，荷兰语中也存在着介词并入的现象，表示目标(Goal)的介词(如to)比表示来源(Source)的介词(from)更易并入。荷兰语中，表示动作目标的介词可以并入动词，但表示来源的介词无法并入，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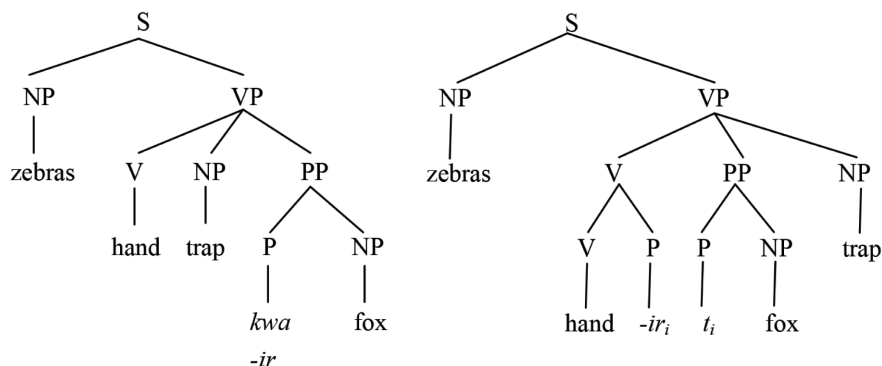
- (58) a. *Omdat zij het bos is door gelopen.*
 Because she the forest is through walked.
 ‘because she walked through the forest’
 (因为她步行穿过了森林。)
 b. *dat dit boek(van) onder het bed is(?*vandaan) gekomen.*
 that this book from under the bed is from come.
 ‘that this book came from under the bed’
 (这本书来自床下。)

(58a)中表示方向的介词“door (through)”置于助动词is (be)后，并入了动词“gelopen (walked)”；而(58b)中表示来源的介词“van (from)”可以组成介词短语位于动词前，却不能处于助动词和动词之间，更谈不上并入动词了。

Chichewa语也有介词并入的现象(Baker 1988: 231)。例如：

- (59) a. Mbidzi zi-na-**perek-er**-a nkhandwe msampha.
 Zebras SP-PAST-**hand-to**-ASP fox trap
 'The zebras handed the fox the trap.'
 (斑马把夹子递给狐狸。)
- b. Mlimi a-ku-i-dul-**ir**-a mitengo nkhandwe.
 Farmer SP-PRES-OP-**cut-for**-ASP trees fox
 'The farmer is cutting trees for the fox.'
 (农夫在为狐狸砍树。)

Chichewa语有两种介词性的成分：一个是词缀；另一个则不是，在它们可以指派的一套题元角色部分重叠 (Baker 1988: 231)。该语言的直接宾语位于动词之后，而间接宾语则出现在由介词“kwa”组成的介词短语之中；也可以词缀形式出现，如 (59a) 中“-er”并入到动词中；(59b) 中“for”直接并入动词“cut”中。在动词后出现相应的语素，这时接宾语提到动词后，直接宾语置于间接宾语后，介词并入也已完成。树形图表示为：



当然，这两种方式，不是所有的语言都具备，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只有独立的介词。墨西哥的一种玛雅Tzotzil语中，也有 (Baker 1988: 232)：

- (60) I-ø-h-čon-be čitom li Šune.
 ASP-A3-E1-Sell-to pig the Šun
 'I sold (the) pigs to Šun.'
 (我把猪卖给了Šun。)

Tzotzil语中，介词词缀“-be”并入动词中，很明显，作为一个词缀，并入是强制的。此外，南太平洋群岛的Chamorro语、Bahasa印度尼西亚语、易洛魁族人的Tuscarora语中，均有介词并入情形，例如：

(61) a. Hu **tugi'i** i che'lu-hu ni kätta.
 1sS-**write-to** the sibling-my OBL letter.
 'I wrote my brother the letter.' (Chamorro)
 (我给我的兄弟写了信。)

b. Ha punu'i si Miguel un i bāubi
 3sS-**kill-for** PN Miguel OBL the pig.
 'Miguel killed the pig for me.'
 (Miguel为我杀了猪。)

(62) Saja mem-**bawa-kan** Ali surat itu.
 I TRANS-**bring-to** Ali letter the.
 'I brought Ali the letter.' (Bahasa Indonesian)
 (我给Ali拿了这封信。)

班图人的Kinyarwanda语，介词“for, on, to”既可独立使用，也可并入到动词中：

(63) a. Umukoobwa a-ra-som-er-a umuhuugu igitabo.
 Girl SP-PRES-read-**for**-ASP boy book
 'The girl is reading the book for the boy.'
 (那个女孩正在为那个男孩读书。)

b. Abaana b-iica-ye ku meeza.
 Children SP-sit-ASP **on** table.
 'The children are sitting on the table.'
 Abaana b-iica-ye-**ho** ameeza.
 Children SP-sit-ASP-**on** table.
 'The children are sitting on the table.'
 (孩子们正坐在桌旁。)

c. Umugore y-oohere-je umubooyi **kw'** -iisoko.
 Woman SP-send-ASP cook **to** market.
 'The woman sent the cook to the market.'
 Umugore y-oohere-je-**ho** isoko umubooyi.
 Woman SP-send-ASP-**to** market cook.
 'The woman sent the cook to the market.'
 (这位父女把饭食送往市场。)

这些例子表明，NP的最终语义角色，依赖于特定介词的词汇特征和特定的主要动词的词汇特征。事实上，语义判断可以通过说P决定NP可以拥有的解释范围，然后V进一步限定该范围，而得到充分的描写。[+施益体的]、[+工

具]、[+处所]。语义选择和Wh-移位会聚于[+受益格]、[+工具]、某些[+处所]短语是临近的动词的论元这一事实。

综上所述，介词并入在世界其他语言中，采取两种方式并入动词，一种是一词缀的方式直接并入动词，另一种则是独立介词，直接并入动词中。前者如Tzotzil语中，介词词缀“-be”并入动词中，后者如Kinyarwanda语，介词“for, on, to”既可独立使用，也可并入到动词，这种并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汉语应该跟一类型相似，“向”可以是一个独立的介词，能单独使用，也可以并入到动词中。

6 结语

本文首先讨论了“向”的历时演变过程，只有“向”完成了由动词向介词的演变，“V+向”的词汇化才有可能。“向”的介词用法始于两汉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完成介词化，在用法上呈现出多样化。到唐五代时期，“向”的介词功能最终确定并且稳固下来，完成了其向介词演变的漫长的语法化道路。对于“V+向”结构的词汇化，互信息值的计算结果、“V+向”类结构的语感调查的结果、词典收录情况及语义的整体性，都能很好地证明“V+向”较高的词汇化程度。“V+向”的词汇化，受制于多种因素，包括语义相关性、双音化、共现频率、句法环境。其中，从句法环境来看，“V+向+O”结构中的“V”和“O”各有不同的类型，“V”对“向”具有选择性，“V+向”对“O”具有选择性，而“O”对“V+向”具有反制约的作用。由于“向”类结构表示具有方位/对象/处所/时间方向事件，动词“V”有“走、跑、逃、飞、迁”等，语义上具有[+方向]、[±位移]、[-终点]等特点，而“向”在结构中，有时可以指示运动的方向，它们在语义上具有相关性。

介词并入并不是汉语独有的现象，南太平洋群岛的Chamorro语、Bahasa印度尼西亚语、易洛魁族人的Tuscarora语等语言中都存在介词并入情况根据冯胜利(1997; 2000)的重音指派规则，“V+向”结构中的“向”通过介词并入，“向”并入动词，在原来的空位留下一个语迹。这是形式上的并入，也是句法-语义上的并入。介词并入，是词汇化的手段之一。但前提是“向”要完成语法化，“V+向”的词汇化才有可能。

汉语中的语法化模式通常为：实义词 > 语法词/附着词 > 词内成分(董秀芳2004)。在汉语里面，一个单位的语法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往往转为词内成分，和相应短语或句法结构的词汇化形成接口，从而使语法化和词汇化产生联系。从“V+向”的词汇化来看，“向”最初是实义词(名词“窗户”，进而演变出动词用法“面对、朝向；前往、接近；仰慕、迎合”，最后虚化为介词“介引(处所、时间)等”)。在“走向成功之路、走向了世界”等结构中，“向”已经演变为语法词/附着词，韵律上“走向”已经凝固成一个韵律单位，时体标记“了”往往标在“V+向”之后；而在“走向新的胜利、奔向二十一世纪”等结构中“向”，已经演变为词内成分。作为一种孤立语(或词根语)，汉语的词和语、词类和词类之间的区别很难截然分清，本来就是一个具有多方面联系的连续统，再加上语言又一直

处于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中，所以有时也难以把语法化与词汇化界限划分清楚。“V+向”在词汇化过程中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何时是词，何时是短语，跟几个因素有关，“V+向”语义透明度，宾语“O”的语义类型，出现的句法环境、共现频率等。但无论如何，“V”与“向”的融合都是渐进、单向性地发展（吴福祥2003）。换言之，如[+渐次性]、[+单向性]、[+融合]、[+渐增性]、[+去动机]、[+隐喻化/转喻化]等特征为词汇化、语法化共享；而另外一些特征，如[+去范畴化]、[+语义淡化]、[+主观化]、[+能产率]、[+类型学共性]，则为语法化独享。正如吴为善（2006: 127）指出的那样“动词跟后置论元的结合显然比跟前置论元的结合紧密得多”。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动+介”组配及“动介”词汇化研究”（13BYY114）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 陈昌来，2002，汉语介词的发展历程和虚化机制。《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3期，15–22页。
- 陈永生，1981，也谈动词后面的“到”——《谈谈谓语后面的“到”的性质和作用》质疑。《重庆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96–100页。
- 储泽祥，2005，“V往+O”的语义约束。《江汉大学学报》第4期，62–69页。
- 崔希亮，2006，汉语介词结构与位移事件。《中国语言学报》第12期，北京：商务印书馆。
- 崔应贤，2004，《现代汉语语法学习与研究入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董秀芳，2004，“是”的进一步语法化：从虚词到词内成分。《当代语言学》第1期，35–44页。
- 方绪军，2004，“V向……”和“V往……”。《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17–24页。
- 冯胜利，1997，《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冯胜利，2000，《汉语韵律句法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蒋同林，1982，试论动介复合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77–86页。
- 李彦强，2010，介词“向”的语法化研究。《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期，46–50页。
- 刘红妮，2010，“终于”的词汇化——兼谈“X于”词汇化中的介词并入。《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25–28页。
- 刘祥友，2007，“向”的介词化过程。《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100–103页。
- 刘月华，1998，《趋向补语通释》。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吕叔湘，2010，《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贝加，1999，处所介词“向”的产生及其发展。《语文研究》第1期，43–47页。
- 马贝加，2002，《近代汉语介词》。北京：中华书局。
- 马梅玉，2010，也谈处所介词“向”的语法化及其动因。《励耘学刊（语言卷）》第2期，44–51页。
- 马梅玉，2013，“单音动词+向”中“向”的语法化及其性质。《国际汉语学报》第2期，186–192页。
- 孟建安，1999，“V向（了）N”中的“向”。《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第5期，61–63页。
- 潘望，2009，现代汉语“V向+NP”格式及相关问题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邵敬敏、周娟, 2008, “动+介+宾”结构的语义模式及认知场景。《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20–28页。
- 史冬青, 2007, 汉语介词研究评述。《东岳论丛》第6期, 75–77页。
- 史冬青, 2008, 介词“向”的历史演变。《潍坊学院学报》第3期, 61–63页。
- 孙朝奋, 1994, 《虚化论》评介。《国外语言学》第4期, 19–25页。
- 汤廷池, 1991, 汉语语法的“并入现象”(上)。《清华学报》(台湾)第21卷, 第1期, 1–63页。
- 王永娜, 2011, 书面语体“V+向/往+NP”的构成机制及句法特征分析。《华文教学与研究》, 第3期, 64–69页。
- 吴福祥, 2003, 关于语法化的单向性问题。《当代语言学》第4期, 307–322页。
- 吴为善, 2011, 《汉语结构的“前松后紧”规则和语法化的不对称现象》, 吴福祥、张谊生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5》, 北京: 商务印书馆。351–366页。
- 吴为善, 2006, 《汉语韵律句法探索》。上海: 学林出版社。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朱新军, 2008, “本来”的语法化。《焦作大学学报》第1期, 21–23页。
- Baker, M. C. 1988. *Incorporation: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Chang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ao, M. 2005. Preposition incorporation in Mandarin. Paper presented at NACCL-17, DLI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Monterey.
- Goh, Gwang-Yong. 2001. The Advent of the Prepositional Passive: An Innovation of Middle English. *English Studies* 3, 203–217.
- Hopper, P. J. and Traugott, E. C.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oopman, H. 2000. Prepositions, postpositions, circumpositions and particles: The Structure of Dutch PPs. In *The Syntax of Specifiers and Heads: Collected Essays of Hilda J. Koopman*. London: Routledge, 204–260.

Bionotes

Luo Yaohua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e has a PhD i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from th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is area of research is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E-mail: yaohua@mail.ccnu.edu.cn

He Li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th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gaoyiheli123@163.com